



北航高研院·治道文丛

治道的历史之维

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

任文利◎著



与先儒一样，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之中，并随时创造着历史。本书让我们一起深入到明代那鲜活的历史与政治世界之中，重新理解阳明学，理解儒家，理解儒家治道范式下的历史。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北航高研院·治道

治道的历史之维

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

任文利◎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治道的历史之维：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 / 任文利著.

—北京：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14.11

ISBN 978-7-5117-2074-0

I. ①治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政治思想—研究—中国—明代 IV. ①D092.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9507 号

治道的历史之维——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

出版人：刘明清

出版统筹：董 巍

责任编辑：王媛媛

责任印制：尹 珺

出版发行：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：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67 (编辑室)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 52612317 (网络销售)
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 (010) 66509618 (读者服务部)

传 真：(010) 66515838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：320 千字

印 张：12.75

版 次：201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8.00 元

网 址：www.cctphome.com 邮 箱：cctp@cctphome.com

新浪微博：@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：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 cctphome)

淘宝店铺：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(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>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：010-66509618

本研究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“十一五”规划项目
(项目编号: SZ200911626024)、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
重点项目(项目编号: 09Bazx032)资助

治道文丛 序

广川董子云：“道者，所繇适于治之路也。”中国之治道，载在五经；百家言尤其儒家之立论，莫不本乎五经，中国治道因此而日新、日日新；依循此道，中国持续生长、扩展，而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。猗欤盛欤，吾国吾民！

二十世纪初，国势陵替，士心思变，竞逐西方新学，中学之统衰微。尤其是中国治道，少人研习。过去几十年来，依凭先人遗留之文明，借助西方传来之技术，中国再度崛起，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。然而，已经富裕的中国如何形成优良治理秩序？

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”中国现代优良秩序之生成、维系，不能不由千古一贯之中国之道。晚近学界、政界，已有此文化的自觉，中国治道之自觉，而有回向大道之努力。

本丛书应此运而生。所邀作者不限年资中外，要在对中国治道有所体认，又有西学功底，普世视野。所收书目不拘一格，或为专著，或为文集，或为译著，要在学有根底，言之有物。所论议题无所范围，或阐释五经义理，或深究儒学奥蕴，或寻绎观念、制度之演进，要在有所发明，有裨益于明道、行道。

编者惟愿与二三君子强勉学问，以求闻见博而知益明；编者亦祈当世精英于各个领域强勉行道，或可德日起而大有功。

蒲城姚中秋谨识于癸巳秋杪

作者简介

任文利（1972—），内蒙古锡林浩特人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毕业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副研究员，弘道书院副院长。主要从事儒学、阳明学与明史研究。著有《国学举要·儒卷》（合著）、《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》。

治道文丛

建国之道——周易政治哲学 姚中秋 著

道统与治体——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 任 锋 著

治道的历史之维——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 任文利 著

儒家与宪政论集 杜维明、姚中秋、任锋等著，任锋、顾家宁 编

法政文丛

政治宪法学纲要 高全喜 著

代议制的基本原理 翟志勇 主编

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 田飞龙 著

埃德蒙－柏克与英国宪制转型 张 伟 著

目 录

第一章 王阳明政治生涯出处进退心迹辨

- 一、“龙场悟道”与王阳明的政治抉择 /002
- 二、刘瑾伏诛后王阳明之出处心态 /005
- 三、正、嘉之际王阳明之出处心态 /010
- 四、嘉靖谢恩之召 /016
- 五、明代政治生态、“得君行道”及“觉民行道”等
相关问题 /023

I

目
录

第二章 王阳明开悟“致良知”与艰难的政治抉择

- 一、王阳明《纪梦》诗 /031
- 二、庚辰王阳明虔州行止考述 /036
- 三、“用兵之地”——虔州 /044
- 四、献俘行在 /050
- 五、张、许之难 /065

六、再赴行在“献俘” /073

七、水灾自劾 /082

第三章 王阳明与“大礼议”

一、邹守益与阳明门下持“继嗣”论者 /091

二、王阳明与持“继统”论诸人的关系 /103

三、王阳明对“大礼”所持观点及对“大礼”纷争的态度 /109

四、对“大礼议”之中的王阳明的分析与评价 /123

附录一 王阳明与杨廷和书误作与杨一清书辨 /131

附录二 崔铎因灾异劾首辅费宏疏误为王阳明佚文考 /142

第四章 “大礼议”及相关问题评析

一、作为历史先例的“濮议” /154

二、“大礼议”的是与非 /167

三、从颁行《敬一箴》于天下看世宗心中的“君权”

与“道统” /175

第五章 从邹守益看儒教士大夫精神世界之所托

一、全生全归 /189

二、上帝降衷 /193

三、上帝临汝 /196

四、戒慎恐惧 /204

五、天德、王道与君臣关系 /210

第六章 从王艮“安身”论看明儒政治转向之开端

一、保身与安身 /220

二、出仕与行道 /225

三、保身以后：王艮之辨孔子 /235

第七章 儒教改制者何心隐及其所殉孔子之教

一、归结心斋之“出处”问题 /257

二、作为教宗的孔子——“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” /261

三、作为宗教组织的“会”及其所寄寓的孔子其身其家 /266

四、何心隐所创“孔教”与传统社会儒释道三教的关系 /272

五、独立于政治建制的“孔教” /284

III

目
录

第八章 何心隐死事考

一、何心隐之死初考 /295

二、何心隐之死再考 /313

三、何心隐从难“朋友”考 /328

治道的历史之维
——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

第九章 邸报与中晚明政治的公开议政

- 一、作为“议政”公开的邸报及其边界 /346
- 二、万历时“留中”之疏藉邸报得以发布 /351
- 三、关于邸报相关制度的几个争议问题 /362

第十章 从刘蕺山之末世谏诤看专制政体下的儒家士大夫 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

- 一、明代政治制度概观 /368
- 二、致君尧舜与无为之君道 /374
- 三、行宪的努力：以票拟归阁臣，以庶政归部院，以献可替否付
言官 /386

征引文献 /398

后 记 /403

第一章 王阳明政治生涯出处进退心迹辨

“出处”是儒家士大夫政治生活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，作为士大夫家族出身的王阳明也不能例外。王阳明生活的明代，史家一般以之为中国古代君权社会专制色彩较严重的一个时期，而王阳明政治生活所历之弘治、正德、嘉靖三朝，应该是明代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，大致而言，乃由盛转衰之始。那么，充分考察在此历史进程中王阳明的出处心态，对于我们全面把握明代政治文化是大有裨益的。谈到这里，我们不能不提到余英时先生有关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个有名论断，即伴随着有明一代政治生态的恶化，儒家士大夫逐渐失去“得君行道”的客观条件，绝望于“兼善天下”，转而“独善其身”。表现在王阳明这里，则为由“得君行道”至“觉民行道”的重大转向。^①关于阳明此一转向发生的论据，余英时先生除了对于整个明代政治生态的解析以及对阳明“致良知”思想本身“觉民行道”的理论意味解读之外，最直接的论据还是源自对阳明自身出处的考察。余先生将论说的重点放在正德初年的刘瑾之难及与此相关的“龙场悟道”上，认为经龙场顿悟后，王阳明通过审时度势的冷静考量，最终放弃了“平治天下”的外王诉求，一心于退隐，并终而转向“觉民行道”。实情是否如此呢？我们不妨首先来看看王阳明之“龙场悟道”。

^① 参见余英时《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》（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》，页10—60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5月）、《从政治生态看朱熹学与王阳明学之间的异同》（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》，页346—362）。

一、“龙场悟道”与王阳明的政治抉择

应该说，余英时先生对于王阳明“龙场悟道”时政治心态的考察是比较精审的，其中，尤以对王阳明《五经臆说》三条的解析有确乎不可易者。^①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，《五经臆说》的确集中体现了王阳明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冷静考察，并最终作出了“遁”的政治抉择。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，王阳明此番考量并不自“龙场”时代始，可以上溯至其上疏触忤刘瑾致下锦衣狱之时。有王阳明狱中《读易》诗可以为证：

囚居亦何事？省愆惧安饱。瞑坐玩羲《易》，洗心见微奥。
乃知先天翁，画画有至教。包蒙戒为寇，童牯事宜早；蹇蹇匪为节，
兢兢未违道。遁四获我心，盍上庸自保。俯仰天地间，触目俱浩浩。
箪瓢有余乐，此意良匪矫。幽哉阳明麓，可以忘吾老。^②

其中，“包蒙戒为寇，童牯事宜早”是对刘瑾事件的具体省察。“包蒙”出自“蒙”卦九二爻辞“包蒙吉”。程氏《易传》云：“包，含容也。二居蒙之世，有刚明之才，而与六五之君相应，中德又同，当时之任者也。必广其含容，哀矜昏愚，则能发天下之蒙，成治蒙之功。其道广，其施博，如是则吉也。”^③其核心意思在于“含容”，具体所指当为

① 笔者曾于《经典与体悟——王阳明“玩易”与“龙场悟道”》（见《情与理——“情感儒学”与“新理学”研究》页209—220。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8年。）一文中对相关论题有所涉及，然于《五经臆说》中与《易》相关之条目，杂取朱熹《周易本义》、王弼《周易注》、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为参照以为之解，而实际确如余英时先生所解析的，阳明解《易》，几全然本于程颐《易传》。

② 《王阳明全集》卷十九，675页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。

③ 见《二程集》，页721。中华书局，2004年。笔者于《经典与体悟》一文中以“包蒙”之“蒙”指人而言，于指明武宗抑或刘瑾颇费考量，后解为指刘瑾。依程传，则“蒙”指时而言。

刘健等廷臣在处置刘瑾之事除恶务尽之心过强，本已拟逐之于南京，仍坚持必欲诛之而后快，终激起强烈的反弹而成此祸。此可与《五经臆说》所云作一参证，“苟一裁之以正，则小人将无所容，而大肆其恶，是将以救敝而反速之乱矣。”^①“童牯事宜早”所针对者亦此事，谓未能觉之在早，其势既成，为之晚矣。“童牯”出于“大畜”六四爻辞“童牛之牯，元吉”，准之程氏《易传》则此意亦更为明确：“概论畜道，则四艮体居上位而得正，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，当畜之任者也。大臣之任，上畜止人君之邪心，下畜止天下之恶人。人之恶，止于初则易，既盛而后禁，则扞格而难胜。故上之恶既甚，则虽圣人救之，不能免违拂；下之恶既甚，则虽圣人治之，不能免刑戮。”^②

“遁四获我心，盍上庸自保”^③则体现了王阳明自身的抉择，如龙场所体现者，为“归隐”。当然，谪居龙场让王阳明对时势有了进一步冷静的分析，并进一步坚定了“归隐”之念。余英时先生说：“他顿悟后，求退的意志十分坚决，这是不必怀疑的，这一意愿当时有没有见诸行动，今已不可考。”^④实则既然阳明在狱中即已决定退遁，据《年谱》，赴谪龙场途中更有进一步“远遁”之念，后辗转至福建于寺中遇一“异人”筮得“明夷”，方打消“远遁”的念头，决意赴谪龙场。也就是说，此间王阳明已决意付诸行动，而且是比较极端的“远遁”的方式，虽因筮得“明夷”而止，实则更多的是顾虑到父亲王华之安危，而打消了此念头。

余英时先生为了论证王阳明龙场后“去意之诚”，曾征引王阳明

① 《全集》卷二十六，页 979。

② 《二程集》页 830。

③ “遁”九四爻辞云：“好遁，君子吉，小人凶。”程氏《易传》云：“君子虽有所好爱，义苟当遁，则去而不疑，……”（《二程集》页 868。）“盍”上九爻辞云：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”程氏《易传》云：“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，而高洁自守，不累于世务者也。”（《二程集》页 792—793）“遁四”、“盍上”皆主退隐。

④ 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》，页 28。

正德十年（1515）和十一年（1516）两次上疏乞求“致仕”为证。实则足资证明王阳明退隐之意的资料尚多，除见于通行本《王阳明全书》之外者，颇值得一提的是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所收录的王阳明正德七年（1512）在京师时“上父亲”一札。^①在此信札中，王阳明对于刘瑾后之正德朝政治形势有详尽的直接评价，因系家书，故放言无忌，是王阳明文字中直接对朝中政事加以评价的罕见文字。而此封信正为向父亲说明自身决然之退意，非但如此，且劝诫老父，“家中凡百，皆宜预为退藏之计”，希望弟辈们亦勿再求于仕进。联系到作于此前正德六年（1511）的《答诸用明》一书所言对于自身求退之念，“老祖而下，意皆不悦”^②，此封家书正是为说服自“老祖而下”（包括其父）的家人们。最终，经过与家人的妥协，王阳明以改南都闲官的方式得遂退隐之念。

但如此诸般，是否就足以说明王阳明“‘悟’后一意求‘遁’”^③了呢？似尚难得出此结论。此须对王阳明政治生涯作一个相对全面的考查再给出结论不迟。就笔者所见，“龙场悟道”后关涉于王阳明“出处”的有如下三个关键点，其一，正德五年（1510）八月刘瑾被诛，王阳明是年岁末于庐陵任上入觐；其二，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正德崩，嘉靖入继大统，王阳明有京师之召；其三，晚年起用两广之前嘉靖五年（1526）、六年（1527）间的“谢恩”之召。

① 关于此札之考证及王阳明此间出处进退心态之考辨见拙文《〈式古堂书画汇考〉王阳明佚书四札附考论》，《中国儒学》第三辑，页214—226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8年9月。

② 《全集》卷四，页148。

③ 余英时语，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》，页29。

二、刘瑾伏诛后王阳明之出处心态

在探讨此问题之前，我们再对“龙场悟道”时王阳明的政治考量作一点澄清，其实，王阳明此时之决意退遁，所针对的只是刘瑾用事，小人之势渐长、君子之势渐消这样一个具体的政治局面，故而正德五年（1510）八月刘瑾被诛，即成为考察王阳明出处心态的一个关键点。此前王阳明于正德五年（1510）三月莅任庐陵知县，这应该是龙场三年贬谪期满的一次正常升迁。据《年谱》，同年十一月获“入觐”机缘，这应该是刘瑾被诛后，朝廷重新起用因刘瑾而获罪的旧臣的结果。^①应该说，此时王阳明退遁之念即已有所松动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前面我们提到过，王阳明此次入京师最终以正德七年（1512）十二月改南都闲官得以变通地实现退隐之愿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王阳明以正德五年（1510）十一月“入觐”，十二月所获“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”即为南都之官，而随后于正德六年（1511）正月“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”。此次由南而改北，据《年谱》，是阳明友人湛甘泉与黄绾“言于冢宰杨一清”的结果，应该说这次改调是符合王阳明本人意愿的。与此后因一意于求退而改南都闲官两相对照，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到阳明于刘瑾被诛初至京师时，退隐的想法是有所松动的。

因为有了刘瑾用事时的政治经验，我们也很难说王阳明此时抱有多大的“仕进”的信心，我们不妨将其此时心态称为观望。而且此次观望很快就有了结果，改吏部主事大概四个月后，王阳明于正德六年（1511）五月三日给父亲的家信中，即再度表达了坚决的退意，“此

^① 阳明于此时有告谕庐陵父老子弟文，中云：“今兹又当北觐，私计往返，与父老且有半年之别。兼亦行藏靡定，……”（《告谕庐陵父老子弟》，《全集》卷二十八，页1030）所谓“行藏靡定”也蕴含了这一层意思。

间决不能久住，……欲归之计非独时事足虑，兼亦身体可忧也。”^①并请其父劝阻其媳妇来京，谓如不能劝阻，也须轻装而来，由此亦可见其去意之决。如前所及，在遭遇家人自上而下的强烈反对后，王阳明终于在上面提及的正德七年（1512）“上父亲”札中，将此间在京师所见政治情势之种种和盘托出。我曾将其归结为三点，其一，君上荒淫无度，迹近无赖。阳明云：

朝廷费出日新月盛，养子、番僧、伶人、优妇居禁中以千数计，皆锦衣玉食。近又为养子盖造王府，番僧崇饰塔寺。资费不给，则索之勋臣之家，索之戚里之家，索之中贵之家。又帅养子之属，遍搜各监内臣所蓄积。又索之皇太后，皇太后（“皇太后”三字疑衍——笔者注）。又使人请太后出饮，与诸优杂剧求赏。或使人给太后出游，而密遣人入太后宫，检所有，尽取之。太后欲还宫，令宫门毋纳，固索钱若干，然后放入。太后悲咽不自胜，复不得哭。又数数遣人请，太后为左右所持，不敢不至，至即求厚赏不已。或时赂左右，间得免请为幸。官苑内外，鼓噪火炮之声昼夜不绝，惟大风雨或疾病，乃稍息一日二日。臣民视听习熟，今亦不甚骇异。^②

这就是阳明笔下为我们描述的作为君的明武宗的形象，诸般情事，史家亦有所载，此则阳明亲见亲闻，百般荒诞无赖，跃然纸上。其二，刘瑾虽已被诛，以张永为首的宦竖依旧恃宠邀功弄权：

永斋用事，势渐难测。一门二伯，两都督，都指挥、指挥十数，

① 此信亦不见于阳明文集，见钱明著《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》，页287。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。

② 《王阳明上父亲二札》之二，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卷二十五。

千百户数十，甲第坟园店舍，京城之外，连亘数里。城中卅余处，处处门面，动以百计。谷、马诸家，亦皆称是。棖楠相望，官室土木之盛，古未有也。大臣趋承奔走，渐复如刘瑾时事。其深奸老滑，甚于贼瑾。而归怨于上，市恩于下，尚未知其志之所存终将何如。

永斋即与杨一清谋去刘瑾的张永，阳明后来平宁藩后曾与之有正面的接触，此信则道出了阳明此时对于张永的观感。其三，朝中大臣攀附张永等中贵佞幸：

邃庵近日亦苦求退，事势亦有不得不然。盖张已盛极，决无不败之理。而邃之始进，实由张引，覆辙可鉴，能无寒心乎？中间男亦有难言者，如哑子见鬼，不能为傍人道得，但自疑怖耳。西涯诸老，向为瑾贼立碑，槌磨未了，今又颂张德功，略无愧耻，虽邃老亦不免。禁中养子、及小近习与大近习交构已成，祸变之兴，旦夕叵测。但得渡江而南，始复是自家首领耳。时事到此，亦是气数，家中凡百，皆宜预为退藏之计。

西涯即时任首辅的李东阳，阳明于此指斥李东阳而下诸阁老为张永歌功颂德，其甚为亲近的杨一清亦不能免。与龙场时对于时局的考量相较，王阳明此时观感堪称绝望，为什么如此说呢？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龙场悟道时王阳明对于时局的考量：

遁，阴渐长而阳渐遁也，……盖君子犹在于位，而其朋尚盛，小人新进，势犹不敌，……君子虽已知其可遁之时，然势尚可为，则又未忍决然舍去而必于遁，且欲与时消息，尽力匡扶，以行其